

人间希望伴我前行



序 言

崭新的 21 世纪已经展开在人类的面前,面临着这个走向更为辉煌的历史时期,绝大多数的人们总是深深地期望着自己以及下一代的子女们,能够在如此纷纭复杂的社会中间,过得更为坚强、智慧和善良。想要真正的做到这一点,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,必须经过艰苦的学习、努力的体悟与诚实的实践,才有可能逐步地实现这样的目标。这部三卷本的《人生驿站》里所选录的许多篇章,正是那些在文学、艺术、科学和政治等领域之内做出建树的作者,通过不同的侧面与视角,洋洋洒洒地叙述着自己童年的生涯、上学的经历,以及迈入成人世界进行谋生的种种体验,叙述着自己是如何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,进行精神上的淬砺和升华的,因此很值得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朋友们,充满兴致地来阅读、体察、参照和借鉴。

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,都是从童年时期开始踏上人世的征途。在这些最初的遭遇中间,肯定会强烈地感受到被钟爱和获得成功的欢乐,以及被折磨和饱经沧桑的悲痛,类似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感受,就在朦胧与幻想的氛围之间,逐步地形成了对于人生的认识和理解。童年是人们走向广阔世界的起点,童年时期留下的许多生动的记忆,在日后百感交集的思索之中,将会催促自己产生出更好前进的愿望来,因此对于每个人的一生都产生着相当重要的影响。

上学和读书的经历,更是迈入人世的重要准备。如果连一书籍都没有阅读过,一点知识都没有掌握的话,那又怎么可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人生呢?像这样只能说是盲目和糊涂地打发着悠长的日子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,逐渐做到由浅入深地懂得人世中间的许多知识与道理,这样的生存方式才是有意义的。而且像这样伴随着知识水准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,当然也就可以更好地升华自己道德的情操和审美的境界。

所有的人们最终都是要在浩瀚无垠和变化万端的社会生活里面,去寻觅着自己各不相同的位置的。人究竟应该怎样在世间生活呢?总应该让自己变得善良一些,尽量替这个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。如果只是使尽心机地去损害和欺凌别人,这样的生存方式是丑陋和耻辱的。真正充满了意义的生活,应该是通过诚恳和勤勉的工作,让自己和众人都获得幸福与欢欣。

有多少历史学家在谱写人类的文明史时,往往会挥写着灵动而又深邃的文字,叙述那些为了追求权力与财富而引发出种种争斗的故事。获得了权力与财富的人们,肯定会陶醉在欢乐中间,不过由此而产生的无穷无尽和凶残酷烈的争斗,又是多么的令人烦恼、忧虑和恐惧,日日夜夜地摧残着生命的健康,甚至会导致受到挫折与失败之后,跌入悲惨的幽谷和死亡的墓地。在这里,癫狂的欢乐与钻心的痛楚,真是如影随形似地纠缠在一起。

如果真正是深深地懂得了人生的奥秘,理解了整个人类世界演变的规律,这样就可以使得自己的心灵变得分外的丰盈。真正具有了能够促使自己朝向真善美此种臻于极致的境界,胸有成竹地攀登而上的主观世界,就一定会更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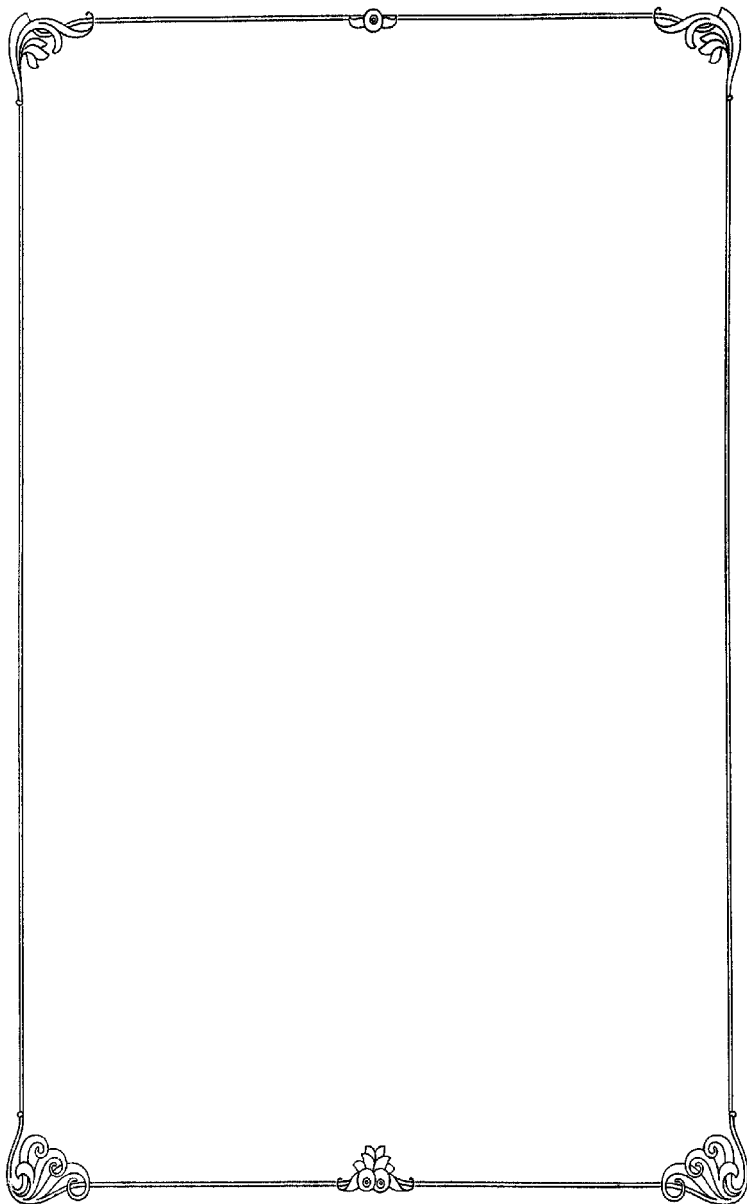
地处置权力与财富此种客观存在的景况。正是从这样的状态而言,古代希腊的哲学家琉善所说的“心灵的富有才是惟一真正的富有”,无疑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。而丰盈的心灵又必须有健康的身体作为保证,因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阐述的“寓于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,乃是幸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”,确乎是极有道理的。

修养自己健全和丰盈的精神,做一个诚实和善良的人,尽量为社会人生做出自己的贡献,这正是我们应该迈上的征途。在这样前进的过程中,如果能够有机会浏览这部《人生驿站》的话,也许会从中受到很多启发的。这里的不少篇章,都洋溢着诚挚和动情的笔墨,写出了那些作者丰富多彩的经历、感受和情趣,在平凡中显出奇崛,在质朴中显出绚丽,这正是最值得年轻一代的读者朋友们,加以细致地咀嚼与思索的。只有像这样深深地理解了前人的心灵和行动,才有可能超越他们而更好地前进,承担起重大的历史责任来。

这部三卷本的《人生驿站》,究竟蕴涵着哪些思想和艺术的价值?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在经过了自已的阅读与鉴赏之后,一定会得出最为确切和最有意义的结论来。

编选者

2002年6月1日



走向社会

2





鲁迅(1881—1936)

浙江绍兴人。现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等，另有《鲁迅全集》印行。

《呐喊》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





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。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

以后,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,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,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,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,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,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;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,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,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,商量之后,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,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,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,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,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,接着又逃走了资本,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,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,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,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,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,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;后来想,凡有一人的主张,得了赞和,是促其前进的,得了反对,是促其奋斗的,独有叫喊于生人中,而生人并无反应,既非赞同,也无反对,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,无可措手的了,这是怎样的悲哀呵,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,如大毒蛇,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,却也并不愤懑,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,看见自己了;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

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

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

周作人(1885—1967)

浙江绍兴人。现代作家。著有散文集《自己的园地》、《雨天的书》、《苦茶随笔》等。

在教育界里

壬子年总算安然的过去了,“中华民国”也居然立住,真是很可喜的事;可是前途困难正多得很,这也是很明显的。新建设的一个民国,交给袁世凯去管理;而他是戊戌政变的罪魁祸首,怎么会靠得住呢?到了癸丑(1913)年的春天,便开始作怪了,第一件便是三月二十日的暗杀宋教仁,这事大概在当时很令人震惊;因为宋遁初这人在民党里算是顶温和的,他主张与袁合作,现在却把他来开刀,那下文是可想而知了。这件新闻,在我的日记里在廿三日项下,平时日记里边都不记这种政治要闻,查阅鲁迅日记也不曾记着,就是我以后日记也是如此,便是乙卯三月被迫取消帝制,也没有记录。直至丙辰六月八日得县署通告,有一条“袁总统于六日病歿,由黎副总统代行职务”的记事。从癸丑至乙卯这两年里,因为二次革命失败,袁认为天下已莫予毒,可以为所欲为,先是终身总统,随后想做皇帝,发起筹安会的帝制运动,历行特务政治,搜捕异己,这种情形以北京为最甚。绍兴因天高皇帝远,还不十分紧张,但也觉得黑暗时代到来,





叫人渐渐有点喘不过气来了。我在这个时期内，一直干着中学教书的职务，一面在本县教育局内做着会长，在教育界里浮沉了四个年头，也就是在那里扮一名“木偶”的角色。虽然那时中学与师范已改属省里领导，改称第五中学等，本县的教育部也换了人，不复是何几仲罗颉伯，虽然朱又溪似乎还在。碰巧是教育会副会长陈津门来告诉我，教育会选举我做会长，劝我就职的是四月廿一日，即是我听到宋遁初被刺消息的那一天。蒋庸生来邀我到第五中学担任英文，乃是四月廿九日，仿佛我是这时决心到那里去“躲雨”似的。古人句云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不过老实说，我们其时还没有这样的敏感，预料到一两年后的事情，也只是偶尔的遭逢，有了这样的两个机会，就抓住了就是了。

我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，自癸丑四月至丙辰三月，十足四个年期，在这时期一共换了三个校长，最初是钱 鹏，接着是朱宗吕，和徐晋麒。我是在钱君的时候进去的，恰巧那时的聘书还是保留着，现在抄录在下面，也是当时的文献，看了很有趣味的。

“浙江第五中学校代表钱 鹏，敦聘

周启明先生为本校外国 教授 订约如右：

一、教授时间每周十四小时。

一、月俸墨银伍拾元，按月于二十日致送，但教授至十四小时以外，按时加俸。

一、除灯油茶水外，均由本人自备。

一、此约各执一纸。

中华民国二年四月 日订。”

八月校长易人，新来的朱渭侠，是教育司的旧同事，又是朱蓬仙的兄弟，蓬仙名宗莱，乃是民报社听讲的一人。渭

侠任中学校长甚久，至丙辰十一月，因患伤寒专看中医，及病去而体已不支，终以是无疾而卒，乃由徐锄榛补充，系两级师范旧生。我的薪水自癸丑八月起，是每周十八小时，每月六十八元，较以前稍好。渭侠人甚勤恳，惟对学生似微失之过严，有一次在教室内训饬一个学生，有一个名叫钱学曾的，自己因有事去找校长，在旁等候着，看了不平，便上前给了他一拳。钱生是嵯县人，“两火一刀”的地方的人，生性本来刚直，本来事不干己，大可不管，乃遽尔动手对付，只落得自己除名了事，听说的都为叹惜，却已无济于事了。

我在教育会里，也是无事可做，反正是敷衍故事罢了，但因为县署有每月五十元的津贴，所以要办点事业，除雇用一事务员和一名公役及支付杂费之外，印行一种教育杂志，以及有时调查小学，展览成绩，有一回居然办过一回教科书审查的事。本来小学教科书，向有各校自由在商务中华两家出版物中选用，这回由教育会审定，似乎也有点越俎之嫌，但是大家不曾反对，结果审定国文一科是中华书局的当选。原来书局方面谁也没有运动，不意中获了胜利，在中华书局固然是喜出望外；可是商务印书馆却气炸了肺，声言要去告状，后来却不知道怎样的不告了，大概查不到我们有接受中华书局的贿赂的证据吧。当时我们的行动，实在有点幼稚而且冒失，在教育界上有那么大势力的，一只大老虎头上，居然想去抓它一下痒，那可不是玩的呀！我们办教育杂志，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，文章是用古文，那是不必说了，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，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，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，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，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。这主张简直有点荒谬了，复古到了极端，这便与清朝的江声书小札或购物开账用



篆文差不多,现在这种实物已经找不到,如能找出来看看,
那一定也是好玩的吧。

